



您为此书添加的 KINDLE 笔记：

极简中国史

作者：勒内·格鲁塞、秦传安

免费 Kindle 极速预览：<http://z.cn/fmhDoEL>

100 条标注

标注（黄） | 位置 134

中国人的原始宗教，其主要目标就是确保季节的循环与农业生活的周而复始相和谐，或者像后来所说的：

标注（黄） | 位置 137

国王的职责就是为管理农事而制定历法，用必须的献祭以及与皇天相协调的仪式活动举行季节仪式。在大祭司这个角色上，国王的首要职责就是主持新年大典，通过祭献一头红牛作为燔祭向皇天祈春。接下来就是耕神田，这是农事开始的

标注（黄） | 位置 147

一种“祖先循环”，这对今天的所有中国百姓来说是很平常的事，但在远古时期却只局限于贵族阶级。实际上，只有那些有理由被祖先灵魂附体的贵族，才是唯一的拥有一颗能够生存下来的灵魂的阶层。事实上，他们拥有两颗灵魂，一颗是纯粹的动物呼吸，注定要变成一种鬼，围绕着尸体盘旋；另一颗则是精神上的灵魂，死后以神怪的形式升天，但只有当其实体被子孙们的祭品所供养时才能生存。这种“祖先崇拜”，本质上与日常或季节性的供奉有关，这些供奉使得死人（被他的牌位所代表）能够参与到家庭生活中来。就它的起源来说（即“地神”崇拜，在原始时期被一棵树或一块粗糙的石头所代表），同样也与这种领主宗教

标注（黄） | 位置 209

玉是纯洁的象征，根据中国古代人的信仰，它拥有一种内在的 “

标注（黄） | 位置 212

璧和琮。璧是一种中心有孔的圆片形玉器，代表天；琮是一件外方内圆的立体状玉器，代表地。这两种玉器形态，就像青铜器一样，可能也用在国王为祈求土地丰饶而献给上天的季度献祭

标注（黄） | 位置 232

无论在中原，还是在美洲，基本而实质的利害关系，远不是政治的此消彼长、盛衰兴替，而是一个勤劳民族对浩瀚无边的处女地的征服，在这条征服之路上，他们只发现了一些半游牧

标注（黄） | 位置 299

朱雀代表南方，玄武代表北方，白虎代表西方，青龙代表

标注（黄） | 位置 343

孔子的思想路径，就我们所能够追寻的范围而言，似乎绝不寻求什么

标注（黄） | 位置 350

他的学说在本质上是一种行为学说，他的教义是一种积极的

标注（黄） | 位置 360

他的教义不承认个人道德与公民及社会道德之间有什么不同。其目标就在于 “

标注（黄） | 位置 361

仁政，要借助君王美德与上天秩序之间的和谐而得到保证。“正是君主的道德力量，以及他从天命中所得到的超自然的影响力，导致他的百姓是为善还是为

标注（黄） | 位置 364

它是与宇宙秩序相联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合作）的一种公民

标注（黄） | 位置 367

墨子援引了一个人格化的神“上帝”，取代了其前任的非人格化的 “

标注（黄） | 位置 367

他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而且本质上是道德

标注（黄） | 位置 374

道家则是一个迥然不同的学派。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的占卜者关于阴、阳、道的观念的思考，这些观念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它们还与自我暗示的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正是远古时期的巫婆神汉们的本行，他们狂热的舞蹈导致了精神恍惚的状态，能够捕捉人们的注意力，并保持神的

标注（黄） | 位置 381

道教从古代巫术实践中保留了某些在呼吸控制上的古怪

标注（黄） | 位置 382

为的是把新入行的人送入迷狂和飘飘然的

标注（黄） | 位置 401

为了让自己与大自然合为一体，加入到宇宙力量中去，道教徒必须压制自己的逻辑推理，“吐尔聪明” [35]。庄子教导

标注（黄） | 位置 403

要“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36] 社会和文明只不过是纯粹的习俗

标注（黄） | 位置 405

不为自己追求生存而违背自然规律，只要顺应自然，便可以长久生存。在日常生活中，道教的最高境界就是“无为”而治。老子道：“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 [

标注（黄） | 位置 409

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

标注（黄） | 位置 414

道萌生于元始的、混成的统一整体，分裂为阴和阳对立的两方，阴阳合和而万物生。这个实体是完全不可知的事物，不能言喻的

标注（黄） | 位置 443

法家。在这个刀光剑影的世纪里，他们尝试建立起不依赖于道德的治国学说。从人的本性出发，连同人的所有恶行，法家创立了一套在本质上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仁政

标注（黄） | 位置 444

法律，即使是在庸君的治下，也应该通过交替使用“二柄”——明赏罚，以确保国家的兴盛和百姓的

标注（黄） | 位置 445

政治是一门技术，判断法律价值的标准，并不是其理论的道德属性，而是其实践

标注（黄） | 位置 465

随着战国时期的到来，早期的侠士之战让位于冒险家的战争，完全没有了怜悯和忠诚，反而发展成了大规模的群众战争，一个国家的全部百姓都被卷入了针对邻国的

标注（黄） | 位置 482

优势就是人民的尚武个性，他们生活在中国蛮荒西部这些偏远的边境地区，是一个拓荒者的种族，是一个屯垦的民族，再加上一个为充分利用这些自然天赋而建立的作风顽强、注重实际的地方王朝，这个王朝早就认识到了那些竞争王朝秘而不宣的弱点，那就

标注（黄） | 位置 484

王室领地为了照顾王家随从的利益而被割裂为许多子封地和私人地产。于是，为了避免这个不断削弱的

标注（黄） | 位置 485

秦王们学会了如何奖赏他们的臣民而无须分割王室

标注（黄） | 位置 486

最后，秦王们还搜罗了一大帮法家围着自己转（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一哲学流派），这些人为了确立国王的权威并证明征服的正当性而构建了一整套包罗广泛的君王和国家的专制主义

标注（黄） | 位置 522

通过大规模的人口交换，他成功地瓦解了最顽固的地方分权制。他的君主独裁政治结束了在中国社会中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标注（黄） | 位置 551

他们通过输入罪犯而实施了类似的移居地

标注（黄） | 位置 654

他们不仅有耐性的优势，而且还有另外一个优势，他们是奠定那个时代道德和宗教体系基础的那些原则的

标注（黄） | 位置 657

儒家文士所设计的家长政体，回到了神话时代的缥缈幻想

标注（黄） | 位置 658

道德言说并非没有意义。这些话的反复言说，显示了皇帝专制主义——由秦始皇创立、被刘邦维持的残酷专制政治——正在赢得文人学士的支持。他们的忠诚，从传统主义者的观点支持了这个政体，因为它越过了那刀光剑影的数百年时光，把自己跟“黄金时代”的先圣前贤们联结了

标注（黄） | 位置 673

人人都有可能被文人学士们持久捍卫的那些乌托邦理论所吸引。答案是，他们不知不觉地为他反对贵族的政策

标注（黄） | 位置 674

文人学士阶层，开始呈现出了未来官僚阶级的雏形，他们让皇帝在针对地主贵族的斗争中有可能占到上风，这个新兴的由皇室子弟所组成的封建贵族阶级不断得到

标注（黄） | 位置 676

为了把这些贵族降级为纯粹的荣誉位置，他使用一个文人政府来取代他们，这个政府由那些以知识渊博而著称的人的子弟所

标注（黄） | 位置 711

汉人对外蒙古未开垦荒地的这些远征，只不过是一种惩罚性的或先发制人的袭击。而汉人更偏爱于把他们的目光转到中亚的

标注（黄） | 位置 734

它充当了儒家文士反对军事扩张的一个借口。“国虽大，好战必亡……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 [68] 在整个中国历史中，我们到处都能找到文人学士们发表的这些雄辩说辞。它们代表了官僚阶层不变的信条，这些信条最终战胜了古代中国的尚武气质。由于文士们的轻视，戎马生涯被视为下等职业的那一天

标注（黄） | 位置 738

到来，到那时，他们的乌托邦和平主义将不可能提出任何先发制人的

标注（黄） | 位置 749

汉武帝确立了辽阔的中国版图，东北至朝鲜的部分地区，东南至安南国，这里在那个时期包括东京湾和今日安南的北部各省，直至

标注（黄） | 位置 751

在内，中国的专制制度通过文人的支持和封建领主的最后没落而奠定了坚实的

标注（黄） | 位置 752

在外，中国帝制的历史版图同样也划过了中亚直至土耳其的西部，越过了朝鲜半岛至首尔的高地，穿过印度支那直逼顺化的

标注（黄） | 位置 759

汉宣帝曾有一次叫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标注（黄） | 位置 801

国家是土地唯一的

标注（黄） | 位置 960

儒士们又有机会拿出他们古老的和平主义理论，要求放弃保护国。基调总是一成不变，在古圣先王的时代——这在中国文人的说辞里总是被描绘为黄金时代——中国并没有外国领土：“局限在其固有的边界之内，人民安居乐业。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供养这些遥远的戍军呢？耗费甚巨，而且也证明无力阻止周期性的叛乱。”

标注（黄） | 位置 1015

在经过漫长的禁欲苦修之后，他认识到这是白费力气，在伽耶（今巴特那以南）的菩提树下，他获得了彻悟。他认识到了众生皆苦的普遍规律，这表明，俗世只不过是不断变化的湍流，最终将沦为悲痛。同时应该说，这种悲观主义，源自于印度人普遍抱持的一种信念，这就是对灵魂转生轮回的信念。西方宗教提出了来世的奖赏，而印度教义中的来世，则是以噩梦的形式出现的，因为，所有这些轮回的机会——生、老、病、苦、死——都是为了永恒的苦难而再生的，这就好像是宣判了来生的苦役。对于这种噩梦般的轮回，佛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要想逃出轮回世界的这种永恒的转生循环，首先必须消灭“对生的渴望”（正是这种渴望导致了转世），消灭自我。这种消灭，是真正的涅槃或者至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佛并不鼓吹自杀（这只能把人投回到最可怕的转世中），而是提倡与激情作斗争，提倡为了一切生命而牺牲个体，把普遍的善推行到为了众生（包括人和动物）而不断自我牺牲的程度。佛的教义，一方面形而上的消极，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克己、贞洁、慈悲和温顺的处世

标注（黄） | 位置 1040

这些高高在上的属灵造像，充满了怜悯和慈悲，在周围产生出一种信任和爱的气氛，这是一种虔诚的、私人化的宗教，东亚还拿不出可以与之匹敌的

标注（黄） | 位置 1051

这并不单单是个崇敬的问题，它还是个逻辑问题：因为，一个最终实现了涅槃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已经去人格化的人，希望通过肖像让他复活肯定是矛盾

标注（黄） | 位置 1107

佛教徒的落发出家是反社会的，因为这种修行方式摧毁了

标注（黄） | 位置 1107

生活，危害到了祖先崇拜，而佛教僧侣则自私地专注于自己的个人拯救，对国家的命运表现得

标注（黄） | 位置 1109

儒家学者和佛教徒一直在拿着不对等的武器互相战斗，因为儒教——在这个词的最宽泛的意义上——所要维护的是官方的国家学说，而佛教，即使是在本人好佛的皇帝的统治之下，也只能代表非官方的活动，这是一种特殊的宗教，不管它在宗教盛行的年代传播得如何广泛，但对中国人的家庭和中国人的国家来说，它始终是外来的

标注（黄） | 位置 1140

画面上的战车队列或舞蹈的神魔鬼怪都充满了速度和动感。这种艺术有着双重的意味，它一方面在贵族生活和军旅生活的场景中努力按照汉代知识分子的想象重构远古时期的历史，另一方面又在幻想的场景中再现了因为被官方儒教所摒弃而实际上已经消失了的神话，这样的神话如果不是残存在道教传说当中的话，我们恐怕知道得

标注（黄） | 位置 1175

正当中央的权力日渐衰微之时，儒家文人却通过为帝国和社会提供官方教条来巩固其

标注（黄） | 位置 1178

175年至183年之间，为了让这个版本永远流传下去，经典原文被刻在一系列石板上，从这些石板上摹拓下来的拓片，便是印刷技术的肇始——事实上中国的印刷术必定有着类似的起源[90]。儒家经文作为权威教条的确立，导致了儒士作为一个组织化阶层的确立。作为官方信条受托管理人的强烈意识，他们倾向于成为一个官方团体——国家的领导团体——并企图稳固他们在朝廷中的

标注（黄） | 位置 1357

事实上必须承认，佛教的发展壮大正是蛮族入侵的结果。在野性盛行的时代，那些饱受精神折磨的人自然而然地要求助于佛教所施与的精神慰藉。此外，像匈奴人这样粗野的蛮人，对这种宗教，不可能有像儒家知识分子那样固执的

标注（黄） | 位置 1447

儒教史家怀有敌意地坚持认为，446年的诏令要归因于在一座最著名的佛寺里发现了醇酒和妇人。但儒家文人对这一伟大印度宗教的指控更加严重：佛教徒的僧侣生活“取消了家庭”，并因此动摇了祖先崇拜的根基，另外，它让人有机会逃避兵役，这对于像拓跋焘这样的军人来说很有

标注（黄） | 位置 1463

流血的时代常常也是信仰的时代。中国最伟大的宗教雕塑——山西北部的云冈石窟（452年—512年）和洛阳附近龙门石窟（自494年起）的那些佛像，就要归功于拓跋

标注（黄） | 位置 1467

北魏时期的艺术也借助了犍陀罗的装饰技法和阿波罗样的面貌特征，目的仅仅在于更完美地表现佛教的纯精神

标注（黄） | 位置 1476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壁龛中那些小佛像的处理方式已经远离了犍陀罗艺术的经验。这些纤瘦的、拉长的、常常还瘦骨嶙峋的形象，有着刚健褶皱的衣饰，但保持着让人安静的简朴和青春朝气的优雅，呈现出某种在全然“刻板”的犍陀罗雕像中所缺乏的东西。这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性的艺术。正如哈金[103]所写的：“这些以令人愉悦的严肃为特征的形式，佐证了艺术对信仰事件的迅速适应。他们预示着高水平的精神生活；它们的造型外观被小心翼翼地削弱了，不再那么引人注目，温柔慈爱的微笑，残留着‘赐福者’对这个世界的唯一

标注（黄） | 位置 1482

据喜龙仁[104]说，云冈艺术是从一种极端神秘的贫乏向造型形式的相对恢复发展的：“云冈艺术，在达到成熟的时候，似乎达到了某种背离其早期风格化的程度。形态更圆、更满，衣服的褶皱不那么僵硬了，线条的相互作用更柔和流畅。不过，形象依然保持着相对冷峻的外观，一种难以形容的内省和超然的气氛，这让它们在宗教雕塑当中达到了很高的

标注（黄） | 位置 1975

唐代抒情诗理解起来似乎更直接，因为它们所唤起的情感是人类普遍经验的一部分。或许，这要归功于唐诗所汲取的多重来源。如果我们分析它的成分，就会发现其中既有古代道教的宇宙幻想（由一种对崇高事物的澎湃激情所引发），又有佛教的忧思（由俗世红尘的万物无常所

标注（黄） | 位置 2205

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130] 儒家文士总是攻击佛教徒的懒惰和出家，攻击道教徒的消极、炼丹和

标注（黄） | 位置 2211

佛教终归还是在中国扎下了根，原因就在于它变得更加汉化

标注（黄） | 位置 2220

试图通过直觉来发现心灵深处完美的

标注（黄） | 位置 2221

这种内省式的投入，这种神秘的净化，无疑可以追溯到印度瑜珈信徒（既有佛教徒，也有婆罗门教徒）的苦行。然而，你可以在这里再次认识到道教观念的逐步渗透。禅宗的沉思，与道教的忘我并没有太大的

标注（黄） | 位置 2225

佛教对中国民众的最大吸引力，就在于它的神话，在于它五花八门的礼拜仪式，尤其是对菩萨的祭拜，这些超自然的存在被创造出来以代表历史上的佛陀。这样的创造是必不可少

标注（黄） | 位置 2226

一种宗教必须提供信徒能够对之祈祷的上天保护

标注（黄） | 位置 2231

随着救世主的缓慢出现，这种对弥赛亚的崇拜也就逐渐衰退了。流行的礼拜仪式转向了另一位菩萨——Avalokiteshvara（他的名字在梵文里的意思是“俯视苍生的主人”），相当于佛教里的上帝。通过一种古怪的变形，在这位菩萨到达中国的时候，他似乎披上了女性的装束。这位俯视苍生的主人变成了“女神”观音，相当于佛教里的圣母马利亚，充满温与与怜悯，她拯救灵魂，把他们从五花八门的地狱里营救出来，让他们重获新生（在她脚下神秘的莲花内），进入美妙神奇的天国。与观音共同承担这项任务的，是另一位神——dhyani-buddha（神秘的佛陀）阿弥陀佛，他被看作是观音的精神之父，观音把他的像戴在自己的头发上。对阿弥陀佛的虔诚礼拜，产生出了一种心灵的宗教，一种真正虔诚的纯粹个人化的崇拜，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基于对菩萨慈悲的无限信任的单独祈祷；只要向阿弥陀佛看上一眼，或者在心灵深处向他发出一声祈祷，就足以获得拯救。这种充满了温柔和信心的个人宗教，或许正是佛教在中国民众中能够赢得更多皈依者的原因，其作用要超过所有玄乎其玄的佛教哲学沉思。无论是儒教还是道教，都拿不出堪与之相比的东西。女神观音被中国百姓所接受，在民间的祠庙里跟儒家的圣贤和道家的神仙并排摆在

标注（黄） | 位置 2243

敦煌的那些旗子（鉴定年代来自唐朝和五代），显示了发展中的各种佛教崇拜。弥勒佛的救世信仰与观音的天国福地并驾齐驱，印度人的俯视苍生的主人，在你的眼前转化成了中国人的观音。这就是敦煌洞窟为什么特别引人入胜的原因。敦煌不仅仅是从依然渗透着印度影响的塔里木盆地艺术过渡到纯中国艺术的交汇点，它还保存了中国被佛教征服之后中国人对佛教的反吞并的唯一

标注（黄） | 位置 2347

中国文人从来都不认为军事力量应该跟文化成就等量齐观。他们的古典气质，或许还有对军人的阶级嫉妒，导致他们系统化地站在哲学的立场上贬低所有尚武的政策。当他们的反武理论导致入侵的时候，他们就会用软弱无力的主张和姗姗来迟的爱国主义批评赢得胜利的军队。《资治通鉴》是一部中国通史，或许是由宋代文人中最合格的代表所编纂的，此书就是这种观点的

标注（黄） | 位置 2392

从11世纪汉人的观点看，一方面放弃北京和大同，另一方面放弃甘肃，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牺牲。除了这三个偏远的边陲之外，大宋王朝依然拥有整个历史意义上的

标注（黄） | 位置 2463

判断投考士子所依据的，更多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和实践知识，而不是他们遣词造句的

标注（黄） | 位置 2475

由官方实施的产品储存，需要一个廉洁公正的管理机构，而实际上的管理机构远不够

标注（黄） | 位置 2517

近百年来，一场宗教复兴正发生在中国人的各种不同的信仰中。在佛教徒中，这种复兴表现在对阿弥陀佛的崇拜中。实际上，这是包孕在老的宗教之内的一种新的宗教；它给中国百姓带来了一种一神论的等价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让所有乐意接受的人都容易理解的虔诚主义和寂静主义；它是一种心灵的宗教，其中有些东西是东亚此前从未见到过的。虔诚的人只要把他的全部信任交付给阿弥陀佛的怜悯，就可以被后者的慈悲所拯救，在不可言说的来世福乐当中获得再生，那是一块名副其实的福地：“

标注（黄） | 位置 2532

知识分子应该当心，不要卷入政治，尤其是对外

标注（黄） | 位置 2583

真山水之云气四时不同：春融怡，夏蓊郁，秋疏薄，冬黯淡。画见其大象而不为斩刻之形，则云气之态度活矣。真山水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欲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

标注（黄） | 位置 2655

李希霍芬[143] 在探访浙江的时候是如何“在他的旅行日记中连篇累牍地记录了与日本之间的这种相似性：森林很少，但每一片奇形怪状的峭壁附近都有一座佛塔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在深谷里，到处是浓密的竹林和参天大树，数不清的水车和巨大的白房子。尤其是这些雨量丰沛的丘陵中繁茂的植被：到处可见成片的松树和栎树，油桐树和漆树；无边无际的肉质叶灌木丛，像忍冬和紫藤这样的藤蔓缠绕其

上；整个山坡上覆盖着桃金娘、杜鹃花和野玫瑰。这是一片鲜花烂漫、灌木丛生之地。在中国的其他地区，都找不出一片这样秀丽如画、色彩缤纷、千姿百态的乡村

标注（黄） | 位置 2683

对于杭州时期的大师们来说，这些物质上的自然环境，只不过充当了一个媒介工具而已，为的是把思想运送到一个纯粹的精神层面。尽管有他们无与伦比的绘画，但对他们来说，形式的世界，用佛家的习语来说，只不过是“露水的世界”，是一条雾气的披肩，通过它，最陡峭的山峰也只是作为纯粹的幻景而升起。他们笔下的风景，淹没于薄雾，迷失在远处，像脸庞一样活泼生动。它的确就是世界的脸庞，杭州时期的大师们想要表达的就是这个世界最普遍的面貌，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想呈现出其更深刻的意义，因为形式的物质属性只有为了暗示隐藏在远处的东西才会显示出意义。这种山川河流、水陆风光的外在面貌越是因薄雾而柔和、因距离而简化，其内在的精神也就辨识得越清楚。因此，人们习惯使用水墨。前景上，有意只画出空旷的轮廓，几棵弯弯曲曲的树，一间摇摇欲坠的小屋，岸边的一条小船，当峡谷中涌出的薄雾与水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小船很快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地平线上，隔着无法计算的距离——介于其间的薄雾让我们失去了跟现实世界的所有联系——出现了起伏的山峦，其模糊不清的轮廓似乎是悬在半空中。有一些笼罩着湿润水汽的风景，被分隔成不同的平面和半遮半掩的近景的具体形式，最后只留下抽象距离中的

标注（黄） | 位置 2744

无限的空间与寂静的和谐”：老一辈宋代大师们所描绘的，正是苍茫大地的面容，它从未得到过像他们所表现出的那么良好的感受、解释和

标注（黄） | 位置 2748

都“迎合了爱好艺术的上流社会的品位，在他们看来，适度节制才是最高的奢华。宋瓷的美就在于它无声的富贵、精致的暗影与微妙的和谐；因为其自身的原因而比其他任何时期的瓷器都更有价值，因为它的质地、色泽、声音和光彩，既赏心悦目，又能满足微妙的触觉

标注（黄） | 位置 2775

宋代之所以显得很突出，不仅仅是因为艺术领域的繁荣兴旺，而且还因为儒家哲学的复兴，以及因为哲学争论的重要意义（这更

标注（黄） | 位置 2803

自从唐代以来，中国的思想家们就一直在竭力拟订一份过去的精神上的资产负债表，以发现它的不足之处，并给它追加一种权威性的

标注（黄） | 位置 2846

最古老的原始中国社会的观念，不仅伴随着后来的道家所苦心经营的体系，而且还伴随着佛教带到远东的印度人的宇宙演化论，只不过勉强用正统儒家的斗蓬给罩了起来。古代印度人的观念也认为，这个世界通过“劫”的无穷轮回而交替经历着扩张和收缩阶段。新儒家哲学家张载（1020—1078）表达过同样

的观念，你或许很想知道，他是不是改编了某段梵文佛经：万物皆始于稀薄物质的凝聚。凝聚到物质变得可以感知的某个点上，它就是“气”。其本质不凝聚、不可见而且无形，这就是“神”。在膨胀和收缩的两重运动开始之后，一切物质都服从于它。物质不可抗拒地膨胀为多种形态，当它收缩的时候又回到其孕育处。这种两重运动是连续的。它在物质的内部发生而不会导致它的改变，这类似于水的结冰和融化的双重现象，在这两种现象中水的本质都没有改变……任何生都是物质的浓缩，而死则是物质的分解。生无所得，死无所失。在个体中，天的规范就是生命元气；在个体形成之后，它就再一次成了天的规范。收缩的时候，物质获得了形态；稀释的时候，它就是转化的

标注（黄） | 位置 2877

太极，作为普遍的宇宙实体及特殊的个体存在背后的因，同时既是先验的，又是内在的，既是精神世界的智性原则，又是物质世界的内在原则。像古老的“道”一样，太极也发散出世界，而世界尽管与它同质，但并不与它同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太极才是永恒的，而那个它周期性地发散出并重新吸收的世界，则是

标注（黄） | 位置 2881

世界的这种发散，或者叫组织，是太极通过“理”的媒介来实现的，“理”这个术语，可以翻译成“理由”，或者“规律”，事实上，它代表着万物的理由，代表着自然法则的总和。这一不变的、必然的规律，对于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所有的存在秩序都是有效的，它是一切短暂的存在形式赖以成形的永久土壤。朱熹用下面的话来解释这一点：“理是一家之主，坐堂待客；他始终都在那里，而客人则来来往往。”自然法则先于被造物存在：“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有理，便有一气流行，发育万物。”[

标注（黄） | 位置 2886

气，这个术语的意义非常宽泛。它最初是气态的、无形的团块，是宇宙及自然法则的支撑媒介的本质和

标注（黄） | 位置 2889

普遍的因，在无限地超越存在的同时，其本身又是固有的。通过在物质中实现自我，它塑造万物，使之成形，使之充满生机，使之内部组织化。它是第一法则太极与万物进行交流的通道。但这种交流只是暂时的：特殊的存在只是来自普遍物质的短期贷款，每一种现存事物的命运，只不过是自然法则的微不足道的

标注（黄） | 位置 2907

朱熹还解释说，这种创造只是暂时的。机体的宇宙，就像个体一样，也只不过是普遍能量的瞬息体而已。千百万年之后，就会进入物质的发散阶段，接下来又是一个新的凝聚和创造阶段。这个过程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这种循环往复是永恒而必然的，是自然法则的精确结果。严格的宿命论控制着这种演化。毁灭和创造被连在了一起，正如那个植物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在产生种子的过程中死去的植物，反过来又会再产生新的植物，在经过一系列转变之后，种子又回到了最初的

标注（黄） | 位置 2915

朱熹明确表示：天就是在我们头顶之上旋转的苍穹。它并不包含上帝（不管古书上怎么说），物质在自然法则的控制之下

标注（黄） | 位置 2946

这幢大厦有点像一座监狱，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有费尽艰辛才能从中逃出来。因为这一体系的强大力量，我们不该无视它的危险，而且，这些危险非常严重。它把所有思考封装在一个被尼采哲学的“永恒回归”的远景所限定的机械进化论的封闭圈中，阻塞了任何唯心论的出口，借此，朱熹阻遏了中国思想的涌流，过早地结束了10、11、12世纪的伟大的哲学

标注（黄） | 位置 3276

从神学的观点看，这只不过是显示对蒙古人所熟知的主要宗教的尊敬，是针对神的不同表现形式所开出的一份保险单，任何更高的估计都可能是

标注（黄） | 位置 3420

从精神层面看，就好像在蒙古统治时期一股清泉在中国人的灵魂中被阻断了一样，这种伤害修复起来将会很缓慢。诚然，在蒙古人被赶走之后，新生的汉人王朝——明朝——在各个方面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以恢复到过去——把这段外族占领时期一笔勾销，让历史从它曾经延续到的那一点上重新开始，事实上，这个断点并不是在1260年，而是在907年。但是，因为它对传统的极其忠诚，因为它想在每件事情上复制过去，这个新生的王朝被一项没有生命的任务给束缚住了手脚。这才是蒙古人入侵在中国栽下的恶根。中国的有机体经受了如此剧烈的休克，如此疲劳虚弱，以至于暴风雨刚一过去，它就紧紧地、胆怯地退缩到了自身之内。中国，几百年来不知疲倦地喷涌了最为惊人的文学、艺术和哲学创造，如今，她除了复制陈旧老套的形式、从副本制造副本之外，再也不敢做任何事情了；她努力保持着对过去的忠诚，却背叛了她最伟大的传统。因为，中国过去的伟大，首先在于她复兴和更新的无穷力量，在于创造性的自发行为，这种创造力，依次产生过商代青铜器的辉煌、庄子的形而上学飞跃以及孟子的超人幻想。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中，我们很少找到这种生命活力的踪迹，相反，倒是发现了自信的缺乏，以及对外部世界的普遍

标注（黄） | 位置 4000

中国历史的模式就是：在出现两三代有能力的统治者之后，王朝就陷入

标注（黄） | 位置 4008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大约15年的时间，这场内战把华中地区蹂躏得一片狼藉，几乎标志着大清帝国的末日。这场革命的失败，似乎有三个主要原因：首先，是领导者们的腐化堕落，这导致内部纷争，致使没能实施改革。其次，是士大夫反对一个有着反儒意识形态的军事政权（太平军的“天王”得到了基督教教义的启示并声称是耶稣基督的

标注（黄） | 位置 4014

造反的危险主要在于衰落时期惯有的地方自治的增长，但在接近世纪之交的时候，也发展出了一股相当可观的改革情绪的

标注（黄） | 位置 4019

假如中国依然保持着与世隔绝的状态，那么一位能干的将领就可能会建立起一个新的王朝，继承清朝的大统。但是，西方的力量和西方的理念正在侵蚀传统的政治观念。史无前例的物质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进入了这场权力的角逐，帝制的大厦终于

标注（黄） | 位置 4034

格鲁塞已经出版了几部研究亚洲史和东方文化的重要著作：《亚洲史》（Histoire de l'Asie, 1922）、《沿着佛陀的足迹》（Sur les Traces de Bouddha, 1929）、《东方的文明》（Les Civilisations de l'Orient, 1929-1930）和《草原帝国》（L'Empire des Steppes,

标注（黄） | 位置 4038

著作：《蒙古帝国》（L'Empire Mongol, 1941）、《中国史》（Histoire de la Chine, 1942）和《世界的征服者》（Le Conquérant du Monde,
